

李戡，  
李戡的爸爸李敖，  
我，和读者你们，  
十七岁时也曾拿起一把无形的“刀”，  
从此人生砍成两半。

——陈文茜

# 李戡戡乱记

李戡 ◎ 著 陈文茜 ◎ 序 李敖 ◎ 导读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# 李戡戡乱记

李戡 ◎ 著 陈文茜 ◎ 序 李敖 ◎ 导读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李戡戡乱记/李戡著; 李敖导读; 陈文茜序. —北京: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0.10  
ISBN 978-7-108-03537-0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②李…③陈… III. ①教育制度—  
研究—台湾省 IV. ①G52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69373 号

责任编辑 郑 勇

封面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卢 岳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 
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

字 数 124 千字

印 数 00,001—20,000 册

定 价 22.00 元

## 陈文茜序

许多人都曾经历十七岁，困惑的、叛逆的、彷徨的、热情的、空虚的。李戡，李戡的爸爸李敖，我，和读者你们，十七岁时也曾拿起一把无形的“刀”，从此人生砍成两半。但李戡的方式最奇特：他出了一本书，《戡乱记》，一刀砍断台湾教科书想在他的脑袋里塞进的垃圾，再一刀砍断整个岛屿想包围他的窒息窝囊，《戡乱记》成了他“与成长之地的诀别书”。

开宗明义李戡引用马克·吐温的话，“我从不因上学而妨碍我受教育”。这十三个字，道尽了一个从十五岁至十七岁的孩子，一千多个愤怒痛苦成长的日子。李戡是一个有思想的孩子，但台湾教育给他的十七岁人生不是展翅高飞，享受最无穷最美好的想象力阶段；相反的，他被迫念起政治指导的刻板历史、公民、国文教科书。他若放弃了，考

不上大学；他若屈从了，看不起自己。于是李敖形容他的儿子，高中三年，饱受窝囊腌臢之气，夜以继日苦撑岁月。李戡的愤怒是全台数万学测学生的共同愤怒，或至少是共同无奈。有些孩子选择逃学（像我），有些孩子选择屈就（像多数的孩子），有些孩子选择把教科书中的垃圾当知识，日后长大成为社会的佼佼者，再回过头来祸害台湾（像永远第一名的陈水扁）。

李戡令我最感动之处是他那么瘦、年龄那么小，却那么强壮专注；他要证明自己的愤怒是对的，于是端起家传李氏独门功夫，数十次进出编译馆，再把烂高中教科书不同版本，相同史实，却因政权更迭，历史也更迭改写的笑话，一一详实记录，集录成书。我和李戡开了一个玩笑，他这个动作，实践的是他父亲李敖仇敌蒋介石的路线，“化悲愤为力量”。

这一点，李戡比十七岁的我高明太多。十七岁的我已视学校教科书为无物，十七岁的我正好抚养我长大的外婆过世，“回”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“妈妈的家”。十七岁的我常常早上假装上学，等妈妈一上班，就溜回家里听心爱的黑胶唱片。十七岁的我虽没赶上西方 1968 狂飙的年代，却赶上了蒋介石死去的年代。我听着 John Lenon 的“Imagine”，Janet 的“At Seventeen”“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?”阅读比教科书大上约三倍的美国历史演说文献英中对照本，并对着镜子想象我是林肯，我是妖骚的玛丽莲·梦露，我

是《自由中国》撰写“反攻无望论”的殷海光，尤其我是那个提倡礼教改革全盘西化的怪咖李敖。李戡的爸爸李敖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启蒙者，他自己文言文一流，却提倡全盘西化；把孔子等说得一文不值，绝非圣人，灌输我这种一知半解的小读者孔子曾走政治后门，“遇南子”偷偷摸摸鬼混了一下午。于是十七岁的我真的全盘丢了中国，不管古典或现代，每日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或托尔斯泰的沉重小说。我全盘西化之彻底，不只阅读，还包括饮食，我不爱与我无缘的爸爸或管教我太严厉的妈妈，只爱可口可乐与巧克力。而我应付教科书的方法很简单，先界定它是骗人的垃圾，因为里头没有“二二八”，也没有我同学孙太平的父亲孙立人“二战”的丰功事迹。其次界定考题性质，是既无聊且无用，连“中研院”院士也答不出来；例如万历死于哪一年？生于什么地方？

我的文茜式十七岁，总在考前一至最多两天前，开始囫囵乱背，把自己当北京烤鸭，灌进一堆教科书；每节考试我总是第一个交卷，因为下一堂还没读完，当记忆最新鲜的时刻错误最少；应付完一门，再接下一门。熬夜两日，比世界杯足球赛还紧张。两天考后，我又回到横躺、横玩一个月的日子；下次月考再相等应付。让老师们为难的是我这种烂学生，功课有时意外极好，历史常得满分，地理、国文、物理、英文……有一次我七科考六百九十八分，只有数学错了一题。其实从学校里我什么也没学会，上课时

做白日梦听鸟叫，想象老师变成一只大鸟却穿上裙子，突然忘形地大笑；同学瞪我，只当是个神经病。而接近满分的结果，是我三天后全忘了，因为那是瞎背出来的，就像灌腻食的北京烤鸭，烤完了除皮脆外，肉全干了。

我的十七岁比李戡滑头，也因此没有他的成就。他那么愤怒，因而产生了力量，宣告自己高中三年没白念，要以扎实的功夫找证据，并向世人证明“杜正胜”们太可恶。

历史教科书为何从蒋家时代至今，现象不同，可恶却相同呢？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教我们的孩子们学习历史；他们想进行的都是“国族主义”的洗脑控制。杜正胜与蒋介石，独立立场不同，残害历史的手法却相同。阅读历史，本来是一件对孩子们的成长极其重要的事；例如我曾在《乱世佳人》书中举的一个例子。1911年前中国正历经大革命的十字路口，康有为主张“君主立宪”，孙中山主张“民族革命”（其实是汉族革命），康有为警告孙中山，革命路线“流血会没完没了”，“革了满人之命，留下的是没有一日稳定的政局”。事实上康有为的预测，后来全成真。所谓“辛亥革命”之后，“各省纷纷响应”，但事实上是多数地区由新军高级军官成为都督直接接管，中国从此进入“军阀时期”。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的另一面，“鞑虏驱逐了”，中国却从此“军阀割据”。1912年1月6日孙中山由临时国会（同盟会主导）推举为临时大总统，但这伟大的理想瞬间幻为泡影。我常问各方豪杰一个问题，“你们知道

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任期干了多久吗？”至今没有人答得出来，答案是九十一天。可见教科书之失败！九十一天后孙中山被迫辞职，让位给掌握华北军权的袁世凯，换取“成就国家的统一”。康有为与孙中山在1911年前的路线辩论，如果能写进教科书多么精彩。康有为的君主立宪，所谓英国式不流血民主革命，因为以“满洲皇帝”为前提，不能满足汉人的种族愤怒，没有革命卖点。而孙中山的伟大与天真，一方面使中国打破了帝制，一方面却也因此迈入长达三十八年的动乱，直至1949年中共建政，国民党流亡至台。国父的伟大与国父的天真，能同时并列于简单逻辑的政治历史教科书吗？

另一个例子是“二二八”，它的起因之一，主因战后台湾被卷入了1945年后的国共内战。1946年出版的台湾银行珍贵资料显示，战后不到一年，台湾已大部恢复了农作生产，没有理由陷入日后物资短缺、饥荒与通货膨胀。当时的台湾被迫将许多生产的物资，送到大陆支援国民党军队；而“二二八事件”中，从原本单纯的林江迈缉烟冲突，演变到初期本省人打外省人，到左派女人（谢雪红）取得台中“二七部队”指挥权，到右派本省士绅与左派台共“内讧”，到国民党二十一师军队后来驰援至台湾一上岸见人就杀……相同类似的场景，虽也曾同时自1946至1949出现于重庆、出现于湖南……出现于大陆国共战乱各地，但是台湾本地人从向往祖国，到失望，到绝望，到愤怒，到抗争

起义，到缴械投降，到屠杀，终至演变成日后关起门来自我历史诠释中的族群政治符号。

这些都是教科书上，你我无法“认识的台湾”。

李敖 1949 年十四岁抵台，我 1958 年出生于台中，李戡 1992 年出生于台北。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各盘踞不同时代，甚至有不同的历史感情；但洪流把我们冲在一起，聚首于一本十七岁孩子写下的早熟之书，共同声讨六十年不变一路可恶的历代教科书。

李戡以此书，最完美地道别了他的高中生涯。而杜正胜“横躺台湾”、“填鸭宣扬台湾史”的最终结果，是使得李戡这类最聪明的孩子，决定告别台湾，奔向北大。这就是政治控制教育的下场，你可以控制笨蛋，但聪明的孩子不但控制不了，反而会因政治干预适得其反。当年杜正胜是年轻学者的时候，是个笨蛋，相信国民党，因此孩子取名为“明夷”（出自《易经》）；中老年后他又跌入另一个笨蛋极端，成了“岛屿派”式国民党，自己成了“台夷”。他和他厌恶的敌人，其实是同一种品种，也因此都是同一个下场。

李戡与其父李敖，文末皆称自己写于“中国台北”；我只想写“台北中国大饭店”，因为这才是我家与李敖书房真正的地址。这一点我比李敖更李敖，更接近自由主义。我相信“少一点主义”，才会头脑清晰。打从二十岁起，我已宣告“我不是统派，不是独派，我是 Apple Pie”；“我不是

左派，不是右派，我是 Lemon Pie”；够全盘西化吧！

李戡才十七岁，论断他的人生还太早；但他告别十七岁的仪式如此“场面浩大”，令我佩服。李敖曾派戡戡为我“干儿子”，李戡口头尚不承认，但也不否认；与我很像江陈会两岸关系，一切未定，但见面关系良好；至少我颇以此“准干儿子”为荣。而此书有李大师导读，我又写序，戡戡反像“三明治”，被他爸与我的长文挤至中央；但我想告诉读者，夹在中央这块“年轻的生命”，才是“真正的牛肉”。

在此祝福李戡，并祝福所有与他同龄十七岁的孩子。丢了你的教科书，愿你们都能勇敢决绝地从此发展自我，挥别“体制”，展翅高飞，寻找美丽新人生。

2010年7月13日，写于台北，中国大饭店旁

## 李敖导读

### 声明

写文章，古代名家讲究“徜徉恣肆”、讲究“行云流水”，其实都是格局中人，放不开的。我一生作文，虽格局自定，但也讲究章法。今年我七十五岁了，要逾矩一下，写这篇天南地北、有点乱七八糟的文章，给“徜徉恣肆”、“行云流水”立一典范，当然也可能开一恶例，是典范、是恶例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黄河天上，水花四溅，“一股脑儿”把要说的，不避拉杂，都给说出来，想到哪里，说到哪里；想怎么说，就怎么说。比例欠当、轻重失衡，说溜了嘴、作走了题，均非所计，此所以恣肆云流也。

声明既竟，请看正文。

## 前篇

1949年5月12日傍晚，我躺在难民船“中兴轮”的甲板上，到了台湾。爸爸的老友张松涵到基隆码头来接我们，当晚搭夜车赴台中，半夜抵达，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。天亮以后，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、张仁园、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屐走路，走得歪七扭八。那时候台中是贫穷的、淳朴的，台湾人穷得罕见谁有皮鞋穿，满街都是日式木屐。台湾脱离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才四年，殖民余痕，处处可见；台民遗风，典型犹存。我的英文老师杨锦锺，因为丈夫是空军高官，用得起佣人——下女。她说她家下女最怕买牛肉，每次到菜市场买牛肉回来，一定把手平伸，远远用拇指、食指提着。那时台湾人不流行吃牛肉，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，下女有所惧，非“个人行为”也。谁想得到，土头土脑的台中人，不但多年以后嗜吃牛肉，并且“卫尔康牛排馆”大火起来，还把火烧成“人排”呢！光在吃牛肉习惯上，就看出外省人带给台湾人的大影响了。

爸爸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同班同学王墨林，当时是“立法委员”，在他的帮忙下，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——台中一中国文教员。正巧我由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的身份，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，也考取了台中二中。台中一中好，我就上了一中。摇身一变，进了初二上。那时初二上有甲、

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六班，我编在初二上甲。

在一中念书，每天与爸爸一同出发，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，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。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，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。第一天上课时，我背着书包，提着上下多层的怪物进教室，惹得全班大笑，说这个“阿山”（指外省人，有奚落之意）原来是饭桶，不然怎么吃这么多，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，饭菜皆在其中，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物，却像吃酒席、吃大餐一般，为之大窘。第二天连忙换了，吾从众矣。

进一中以后，班上春假要远足，我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，乃提议去日月潭，全班一致通过。回家向爸爸伸手，爸爸说：“我们家早起刷牙，买不起牙粉，更买不起牙膏，只能用盐水刷牙，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？”于是，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，我在家里日月潭。

初二时候，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秀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，找到我，要我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，那时我穷得没钱照相，乃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，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。不料画好了，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，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，老朝外透，跟帽子打架。愈看愈不敢亲自送，乃央求班长陈正澄（后任台大经济系主任，又讲学于日本，是名经济学家）代递。害得正澄和我的现代画，一律被老师斥回。老师说，他一辈子也没见

过这种照片。于是，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，我在家里菲律宾。

由于三姐、四姐也在中学念书，爸爸分别为她们买了草帽，四岁的弟弟吵着也要，爸爸加买一顶。大妹妹想要，不敢说，偷偷在屋角饮泣。

诸如此类的穷故事，显示了我家来台湾，虽然爸爸找到了职业，但入不敷出，生活仍旧穷困。穷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喘病、妈妈又开刀等等，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已变卖殆尽，唯一的模范西巷四两黄金顶来的房子也不得不卖掉。台中一中终于分配了我们半栋宿舍，那是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，只有八个榻榻米大，外加前后两个小玄关，我们一家九口住进，其拥挤可想。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，在我家几十年的老妈子老吴转到“立委”阎孟华家去帮佣了，我们又有幸转到木屋的另一半，才稍觉宽松。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，并且厕所不在院子里而在屋里，比较像样一点。我家在存德巷十三号一住十三年，这一老宅，横亘了我的中学时代，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。但我个人比全家人都幸运，我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，隔了起来，算是我自己的独立天地，在这小天地里，我一桌一椅四壁书，快速地成长、辛勤地写作，奠定了我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础。

从初二到高一，十四岁到十六岁，我因为国语好、国文好，参加过多次演讲、辩论、论文比赛。初二时得过全

台中市第四届全市国语演说竞赛，得初中组第二名（第一名是我四姐，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；第三名是张立纲，他代表台中二中。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姐夫，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。广义地说，台中市演讲比赛被我们全家包了）。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、本校论文赛，皆获第一名。高二时在《合作经济》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《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》，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，得了全台湾第一名，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。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《饮冰室合集》。

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，我在高一也写过《李敖札记》四卷；并在《学生》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《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》；在《新生报》发表《〈英伦归来〉的启示》、《生也有涯知无涯》；另外还写了《学习英语的目的》、《诸葛亮的军政》、《虚字的对联》、《字形的对联》、《毋忘在莒的出处》、《行李考》等稿子。那时我十七岁。

1953年我念高三，只念了十几天，就自愿休学在家。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，轻松地说：“好！你小子要休学，就休吧！”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，他跑到学校，向教务主任说：“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！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！”于是，我蹲在家里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。也写了不少东西，其中有《李敖诗集》一册

和《从读〈胡适文存〉说起》一文。过了两年，我进了大学，陆啸钊办《大学杂志》，把这篇文字拿去刊登。刊登后近一年，有一天，我的女朋友罗君若忽然提议，说：“何不寄给《自由中国》？他们一定登！”于是我删了一部分，她代为抄好，遂改登《自由中国》。这是我在《自由中国》上发表的第一篇、也是最后一篇文章。这篇老练的文字，大家都不清楚是我十七岁时写的。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，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、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。到台湾时，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，进台中一中后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。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，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。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，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，单用鼻子就能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，这是我在teen-age中，最得意的一门绝技。

在制式教育中，我慢慢长大，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。就客观环境来说，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。在残余记忆里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、肤浅、缺乏常识与性灵；就主观感受来说，我读的课外书愈多，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，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。中学的教育制度、教授法、师资、课程分配等等，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，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——

《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》，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“进步教育”（progressive education）有着极强烈的憧憬，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，到了高三，我已完全不能忍耐，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，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。

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，但在思想定型上，却是读了许多书、困学求变以后的事。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，其中包括左右问题、中西问题、新旧问题……这些多方面的问题，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，由于水平不好、政治干扰，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，他们困惑终身，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。在这方面，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，但在这些问题上，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。这段时间最明显的是在初中，到高中后期，我就逐渐定了型。那时候，我正十七岁，我的最大顺境是我孤独中的进步；我的最大困境是我陷身在孤独里，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商量讨论，只有自己暗中摸索、探境寻幽。更大的困境是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氛围，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、管制书刊，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，新书一本也看不到，而我在北京时候读过的大量左派书刊，又在我心里发酵，我益发看不起国民党，并且益陷困境。我的老师严侨的被捕，更带来震撼。

我在台中一中，最难忘的一位老师就是严侨。严侨是福建福州人，是严复的长孙。身材瘦高、头生密发、两眼